

张勤德 著



诤问 与 答辩

——焦点纵横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诘问与答辩

——焦点纵横谈

张勤德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长春

(吉)新登字 12 号

诤 问 与 答 辩
JIEWEN YU DABIAN

——焦点纵横谈

张勤德 著

责任编辑：王忠山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王春华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长春市人民印刷材料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11.25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0 千 印数：00 001—20 000 册

ISBN 7 - 5602 - 1887 - 3/C · 24

定价：11.50 元

目 录

焦 点 放 谈

抓住解决群众最不满意问题的“牛鼻子”	(1)
两点不同意见	(5)
必须把农民问题继续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7)
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11)
破除“金钱最高标准”论	(13)
四问“私有化改革”论者	(18)
当前的四个紧要问题	(21)
唯亲·唯诺·唯贤	(23)
赞《世纪行》	(26)
“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怎样改变？	(28)
答问二题	(34)
找准“最佳结合点”（代序）	(38)
好事和坏事的辩证法	(41)
“一切向钱看”问题的反思（对话）	(44)
“一切向钱看”对改革的危害	(52)
讲政治须解开五个“扣子”	(56)
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	(60)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应纠正四种错误认识	(63)

附：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首先应纠正哪些错误认识？

——与张勤德同志商榷	(65)
对张勤德同志的文章不应全盘否定	(67)
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四种错误认识”无关吗？	
——与李盛平同志商榷	(69)

理论探讨

“现代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四大危害	(76)
“唯利主义”对谁有利？	(83)
“两个文明一起抓”理论探津	(88)
如何纠正“庸俗社会主义”倾向？	(96)
生产力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100)
生产力标准问题的对话	(105)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增强党性	
——对于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式难题	
的探讨	(122)
简答“现代社会主义”论者	(127)
“现代社会主义”论者和我们的主要分歧	(130)
反“和平演变”的若干问题	(139)
改良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	(149)
思维和存在是有同一性的	
——与杨献珍同志商榷	(153)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	(166)
“社会主义必然异化”论的实质和危害	(169)
试论社会主义的政治特征	
——兼与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性”的同志	
商榷	(180)
认清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86)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含义和内容	(191)
防止畸形发展，促进全面进步	

——读卫建林《发展理论若干问题》等文·····	(195)
-------------------------	-------

调查研究

全面落实农村政策要摸准“症结”

——江苏、山东等地的调查与思考·····	(206)
----------------------	-------

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重汽等九家企业的调查·····	(214)
-------------------	-------

发挥职工企业主人作用须注意三点·····

(219)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223)

对“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的思考·····

(229)

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三个必须”·····

(237)

西方人士论苏联解体·····

(243)

生产力标准问题探讨情况综述·····

(252)

“一手硬，一手软”的表现、成因和对策·····

(259)

宴店的“三不”·····

——北京市房山区宴店村调查报告·····	(275)
----------------------	-------

集体经济的八大优越性

——吴仁宝等访谈录·····	(280)
----------------	-------

“苏南模式”和发展理论·····

(285)

九大热点争鸣综述·····

(290)

江西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三条经验·····

(301)

上海调查·····

(314)

王洪彬与“南街之谜”·····

(326)

怎样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调查报告·····	(335)
----------------------	-------

“南街模式”的理论启示·····

(345)

焦点放谈

抓住解决群众最不满意问题的“牛鼻子”

大家知道，腐败风气、社会治安、分配不公、非法暴富，是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有人把它们叫做“四个老大难”。对这些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抓，但效果显然不能估计过高。“四个老大难”病根子究竟在哪里？什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牛鼻子”？邓小平同志说：“多年来，我们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

这就告诉我们，要找准“四个老大难”恶性发展的深层症结，就事论事不行，必须看到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系，同“补课论”（补资本主义之课）的关系。

根据什么说“四个老大难”的发展和“补课”论有关系呢？请看：

有的论者在公开报刊上写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企业界来说，挣钱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赔钱就是反社会主义。”把挣多少钱当作检验社会主义的标准，可见把金钱标准抬到了多么高的地位，可见金钱的影响力达到了何等深的程度。水涨船高。那些把金钱地位越抬越高的地方，“四个老大难”也往往越来越严重。把挣钱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无疑是把社会主义庸俗化，是搞“庸俗社会主义”。这种假社会主义思潮，对“四个老大难”显然会起助长

作用。

一位论者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认为，“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三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三者通常被看成是社会主义本质性的特点”。他认为这种“传统社会主义观”已是不正确的了，应通过改革加以革除，树立起“现代社会主义”观。按照这种“现代社会主义”观看问题，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社会主义，反之，就是资本主义。可见，生产力实际上是他们的唯一标准。

但是，这么办许多问题是说不通的：我国这些年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速度差不多，把生产力当作唯一标准而不看实行的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显然无法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而硬把生产力作为唯一标准进行区分，自然一方面会把社会主义问题搞乱，一方面会把资本主义问题搞乱，同时也抹煞两者的根本区别。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宝，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武器。把三者都否定掉，等于想缴去我们手中的枪，捆住我们的手。这种“现代社会主义”对“四个老大难”自然会起助长作用。

有些论者认为，我国现在“生产力的发展还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不能“把公有制为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而必须“改革公有制”，“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成果和组织经验统统接受过来”。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不是一种“资本主义有益无害”论。

我们知道，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组织经验”，是个相当广泛的概念，是几乎可以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统治经验都包括在内的。把这些经验接受过来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江泽民同志指出，腐败之类现象，从根本上说，是根源于剥削制度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有益无害”论对“四个老大难”自然会起助长作用。

有些同志极力宣传“‘两个不问’（即‘姓社’不问，‘姓

资’也不问)有理”论,给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扣极左的帽子。他们说:“只要是三个‘有利’,即使碰上资本主义也没有理由后退”。

我们所主张的问“姓社姓资”,当然是指在涉及方向道路的问题上,要记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决不是说在不涉及方向道路的问题上,随意乱扣“姓社”或“姓资”的帽子。例如,有人爱吃米饭,有人爱吃面条,你给扣上“姓社”或“姓资”的帽子,岂不既可笑,又无用?但是,在涉及动摇党的基本路线,涉及“左”和右之类问题时,如果连问都不问一下“社”和“资”的问题,不就是如小平同志说的“连常识都不懂”?这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就成了一句空话?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命运前途都是由社会主义管的,如果连“姓社姓资”、“搞社搞资”都不问,那么,公有私有、爱国卖国、人格道德、红的黄的(色情)当然更不值得问了。这样,腐败不腐败,分配公不公,治安好不好,暴富的人多不多,自然统成了不屑一顾的事情了。因此,这种“‘两个不问’有理”论,对“四个老大难”自然也会起助长作用。

这些论者究竟为什么要极力宣传“现代社会主义”、“庸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益无害”和“‘两个不问’有理”这“四论”?“四论”的要害到底是什么?只要认真分析一下,便不难发现,“四论”的共同特点是认为我国没有达到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应当退回去补一下资本主义的课,起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可见,它们的要害是“补课”。不然的话,怎么能说我国现在“生产力的发展还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怎么能说“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必须革掉的“传统社会主义”的东西?怎么能说“问姓社姓资”统统都是“左”?而认识到“补课”论这个要害,对于他们宣传的“四论”便容易看透了,对于他们促进“四个老

大难”的恶性发展，便容易弄懂了。有位“补课”论者一语泄露了天机：“中产阶级用金钱欲来腐化这个政府”，会“促使这个社会的演变”。看来，他们是把搞腐败等等，当作促进回头“补课”的措施加以运用的。正因为这样，那些受“补课”论影响较大的地方，“四个老大难”问题也就比较严重。

抓住了“补课”这个要害，抓住了“四个老大难”恶性发展的总病根，我们便不难认清，解决群众最不满意的“四个老大难”问题的“牛鼻子”，就是纠正“补课”论，进一步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同志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搞清楚这个问题。”真正在思想上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树立起正确的社会主义观，能够完整准确地运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就一定能够解决好“四个老大难”问题。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都被推翻了，蒋介石的 800 万军队都被打垮了，“四个老大难”怎么能把我们党压垮？所以，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1995 年 6 月

两点不同意见

看了贵报《工人日报》关于高消费问题的讨论文章，受到不少启发。现对一些同志论及的问题，略谈两点不同意见。

一

能不能把高消费作为一个社会步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无疑应不断提高。但这里所说的高消费，指的是那种一味追求高档享受的畸形、有害的消费倾向和现象。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高消费是公开提倡的东西。我们则不应提倡。这是因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富强、民主、文明是融为一体的。把高消费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难以抵制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难以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以，把高消费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二

可不可以说离开高消费就不能刺激生产发展？

建国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比实行高消费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高好几倍。在这个事实面前，硬说离开高消费就不能刺激生产，我认为信服的人是不会太多的。

我们所要发展的生产力，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社会主

义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它是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生产力，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生产力。所以，我们决不能
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孤立、片面、抽象
地谈生产力问题，绝不能用高消费刺激生产，绝不能靠全盘照搬
资本主义办法去发展经济。江泽民同志说得好：“怎样才能把经济
建设搞上去？我看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这就
指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特殊发展规律的。掌握了这个规律，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落实好十四大报告提
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方针。

1994年2月

必须把农民问题继续作为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可以说是毛泽东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创造。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我们党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和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显然是分不开的。

建党初期，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重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一种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重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而他们都感觉自己的力量不足，但不知道到哪里寻找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广大农民尤其是贫雇农，生活非常穷苦，革命性相当强，而且人数众多，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就使我们党所领导的力量得到迅速的增强。

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具体的道路究竟应当怎么走？像俄国那样搞城市暴动行不行？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村的统治相对薄弱，由于农村天广地阔，回旋余地大，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农民革命性相当强，人数众多，农村革命根据地便迅速发展起来。八年的抗日战争之后，仅仅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新中国就诞生了。

建国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几年后，农村

的两极分化开始出现。为了防止这种分化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一方面号召把农民组织起来。于是办起了互助组、合作社，后来，又建立了人民公社。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农村合作化“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6页）尽管有这些失误，但走集体化道路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在解决农民问题方面，是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的。主要表现在：

一

注意从本质上发现和发挥农民群众的革命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早在1926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不仅贫雇农“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即使自耕农在革命潮流高涨时，也可参加革命”。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指出，农民群众“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大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又强调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充分了解 and 正确认识农民群众，显然是不可能充分相信和依靠他们，充分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二

切实关注农民的疾苦，为农民谋幸福，领导他们为实现自己

的利益而斗争。例如，即使在国共合作组成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领导了抗日根据地内“减租减息”运动。1947年，在解放战争初期，各解放区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在“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下，广大农民踊跃参军或推小车支援前线，投入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斗争的洪流。结果，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打败了用飞机加大炮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的800万军队。

三

既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又反对尾巴主义，努力把农民成分的革命者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在井冈山时期，我们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是怎样把“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建设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党的问题。正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并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建国以后，他还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只有领导农民阶级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改造、提高、进步，才能牢牢地把握中国历史进步的主动权。因为，所谓领导权，最主要的是对于农民阶级的领导权。农民不买谁的帐，谁的领导权就多半成了空话。而农民如果离开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也就不能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义和团失败的原因，又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而且可以找到从陈独秀到王明的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病根所在。由此才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才有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才有党在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把日本学者新岛淳良所说的连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农民和士兵大众，与共产主义理想和科学思想体

系这看起来天地相隔的两者联系起来，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非凡胆略和对中国实际深刻把握的。而实现这一点的正是毛泽东同志。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才做出了重大贡献，显示出从未有过的创造力。遍布广大土地上，历来被认为一盘散沙似的农民，团结成为所向披靡的革命大军。昨天还是怀有小私有者心理的庄稼汉，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为怀有崇高理想和显示出巨大历史自觉性的无产阶级战士，成长起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治党、治国、治政、治军、治经、治文的卓越人才。这不能不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甚至世界上的一个奇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在新形势下得到继承和发展。关于我国农村改革的方向，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5月就明确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他还多次强调：我国农村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次飞跃；生产发展了，农村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经济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经济，这将是又一次飞跃。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了80年代农村改革的经验，深刻分析了目前农村存在的问题，对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概括为：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这就使整个农村工作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健康发展。

毛泽东同志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国以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我们无疑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还有许多伟大的工作要做。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来抓。如果掉以轻心，重犯忽视农民问题的错误，那同样会吃大亏。对这一点，务必要充分注意。

1993年10月

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工人日报》开展“少数人腐朽的生活方式‘无关大局’吗？”的讨论，问题抓得准，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并且“大家谈”这种形式也很好，不同意见进行交锋，有助于把问题搞清楚。

这个专栏发表的文章，我都看了。我的意见是，把少数人的腐朽生活方式说成无关大局的小事，是不妥当的。这主要是在于：

—

生活方式是涉及到社会生活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这既说明了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又说明生活方式含有生产方式的内容，因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也是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方式是一个含义相当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物质生活方式，又包括精神生活方式；既与社会价值导向相联系，又与社会政治方向相联系；既是一个怎样进行生活的问题，又是一个为什么这样生活，为什么要坚持这种人生观的问题。腐朽生活方式的存在，既是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影响产生的一种结果，又是私